

30年前,我甫出校门来京供职,因对文学爱好未忍轻抛,而在业余写点东西。1985年初,草成《从英雄到普通人——论我国当代文学观念的转变》,觉得较之前他稿可取处稍多,而蔽帚自珍,不甘心将它匆促发表。但那时,我们这些“外省青年”,在京无根无柢、四顾茫然。偶与单位里一位文学字交聊起,他说可介绍给《文艺报》编辑部主任刘锡诚看一看。于是,某晚便与合作者张陵一起,冒昧登门。其时,两个毛头小伙愣愣,携一卷稿子,只手来敲刘家的门。刘老师和蔼地请我们入内,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,对我们说鼓励的话。我们则笨嘴拙腮,没坐多久留下稿子就回来了。稿子字数有15000字之多,我们没想过,单这篇稿《文艺报》就不能用,况不惟篇幅,其内容亦与《文艺报》并不相宜。但不久得知,经刘老师推荐,文章被《当代文艺思潮》采用,以1985年3期头条发出。后又辗转听说,刘老师逢人提起该文热情称扬,不吝好评,以至“别林斯基风格”形容。时隔多年想此事,益感敬勿。我们与刘老师确实素昧平生,况且日年轻事亦显懵懂,刘老师非但不见怪,且未虚予应付,而是将稿子认真看过,虽不用于《文艺报》仍为荐诸别处,令它有好的出路。

也是同年9月,我参加了“《文艺报》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”。此会背景,是所谓“青年批评家”群体崛起。当时亦有以“第五代批评家”相称的,但何为第一依次而至第五代批评家,我个人不曾了然。约述之,大致从1983年起,文艺批评中有一群年轻人趋于活跃——这显然得益于恢复高考后大学教育的进展,亦即七七、七八级大学生学成毕业,走上社会及工作岗位。内中有两件对“青年批评家”崛起,可谓具有奠基之效。一是1984年12月杭州“寻根文学”树帜有青年批评家存在与参与,二是1985年3月厦门文学方法论讨论会上青年批评家表现引人注目。不过截于此,青年批评家虽让人领略其活跃身影,但作为群体在文坛亮相或者登台,还缺少一个仪式,而“《文艺报》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”,大抵就是为此而备。那时,这确系惟《文艺报》及其背后中国作协方能执其牛耳的事情。文坛井然有序,一丝不苟。《文艺报》也深知个中意蕴,故于此会,努力造成一种规格上的印象,对与会人选之拟邀,兼顾活跃度、知名度和地区分布;总之,虽未冠以“代表”名目,实际是要开成有那种氛围的会,最终来体现中国作协对青年文学批评队伍建设的引领——这是我个人有关经历所领略的一点感受。

这两段我与《文艺报》有关的经历,本无联系,之所以在这里摅为一述,是因想到一个典故。1954年,《文艺报》因对李希凡、蓝翎红学文章的处理,触怒毛泽东,被批为“小人物”“往往加以阻拦”,留下了压制新生力量的恶名。从当代文学史上学这一段,印象颇深;加上后来“两个批示”,毛泽东还以“做官当老学”形容文联各协会,我想象中的《文艺报》风度更油然是一种居高临下、盛气凌人的样子。可是等到亲自接触,体验刚好相反。上述两事中,刘锡诚老师作为个体具体体现了《文艺报》编者对无名后生热诚汲引的作风与胸怀;“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”则让我体会到,作为机构或部门,《文艺报》对青年人才与队伍的培养,不光有主动的意识,也有及时的行动。总之,脑中先入为主所预存的那个不知爱惜新生力量的《文艺报》,我终于没遇见。

以上是我初中阶段作为《文艺报》的小读者留下的一些好的印象——当然这印象是重新翻阅旧刊后验明并放大的。进入高中和大学后,因为功课的日益繁重,也因为文艺批判风声日亟,《文艺报》开始不断批判起过去自己肯定过的作品,主张过的论点,让人感到困惑而无所措手足。版面上的专家美文如上所述者,也日渐稀少,消失了。年齿渐长的我对《文艺报》反而不常寓目了。虽然,我还是以为自己不失为《文艺报》的一个受益匪浅的认真的读者。我后来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,一直努力于当代文学新作评论的写作,不能不说有几分拜《文艺报》启蒙、启迪之恩赐的成分。前辈评论家、作家的哺乳之恩,我是不敢忘却的。

说到作为一个作者我给予《文艺报》的回馈,实在乏善可陈,有点汗颜。现在能想得起来,觉得还值得一说的,有这么几段:

一是上世纪80年代,雷达同志来约我,写了一篇《陈建功和他的短篇小说》,这是我《文艺报》写评论的开始。后来,我还参加了《文艺报》召开的那次影响广泛的全国青年批评家会议,有幸结识了许多堪称一时之选的青年批评家朋友,见证了文学观念、文学批评方法多样化的盛大场面。

二是1985年《文艺报》由改报之后,颇有振作的气象。有一次我看到《文艺报》在讨论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在刊发了从维熙的点赞文章之后,又刊发了老评论家李清泉的文章《赞赏与不赞赏都错——关于〈红高粱〉的话》。我于是受到了鼓舞,觉得《文艺报》还是一张践行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的报纸,于是写了一篇评论与时贤不太相同的论韩少功的《爸爸爸》《蓝盖子》《归去来》的文章《黑色的魂与蓝色的梦》,寄出后也很快发表了。至此,以后遇到《文艺报》上不时发起的一些文学论争,遇到自己也想谈点看法的,就会主动投稿,参加进去。与鲁枢元元榘的文章《新时期文学“向内转”之我见》《为什么说“向内转”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?》两文,也就这样在《文艺报》上先后发表了。后来所写的《略释周作人失节之谜》与《期待真正的学术论争——从周作人附逆之“谜”的论争说开去》两文,也都是《文艺报》上发表的。这些文章既然是为参加文艺论争写的,发表后受到不少反批评,我认为这也是正常的——只要这反批评也是学术的而非一味鼓噪、谩骂的,我是愿意倾听并心存感激的。

作为一度为《文艺报》写作较勤的作者,就我与《文艺报》这题目琐忆下去,当然还有不少事可记,不少话可说,但就此打住吧,这篇篇幅已经超出编辑约稿时许可的字数许多了。

那些远去的身影

□陈德宏

而亲密,以至于发展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,首先得益于吴坚、程士荣、武玉笑、杨文林、谢昌余这些老领导,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“老延安”,有的还是冯牧的“鲁艺”同学,由于他们与冯牧关系密切,交往频繁,才把我这个“小字辈”人物带到了冯牧面前。其次,更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纽带,是我供职的文艺理论刊物《当代文艺思潮》。

《当代文艺思潮》是全国第一家省级文艺理论刊物,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应运而生。《当代文艺思潮》实际上是从《飞天》分蘖而出,紧锣密鼓的筹备期是1981年,冯牧正在甘肃“养病”,谢昌余、杨文林等甘肃省作协领导,多次向冯牧谈及创办新的文艺理论刊物的设想,获得了他的支持与指导。实际上,《当代文艺思潮》在创办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冯牧的认知、经验、思想及智慧,而冯牧对《当代文艺思潮》的支持与关爱,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上。创刊号1982年1期就刊出了冯牧的重头文章《关于理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一些随想》。这篇文章是1981年9月16日在兰州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,而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又是《当代文艺思潮》筹备创刊的通报会及全省文艺队伍的动员会、约稿会。因此,我一直把冯牧的这篇文章当作他对刊物的期望与要求。再者,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出冯牧与甘肃的情感之深厚——8月2日刚刚结束数月的“养病”从兰州返京,时隔一个多月的9月16日,又行色匆匆地为那个座谈会往返奔波。以文章支持刊物,不辞辛劳地参加活动,冯牧对《当代文艺思潮》可以说关爱有加,有求必应。

1984年6月我从偏处西北一隅的兰州到北京约稿,第一次见到唐达成。当时《当代文艺思潮》因刊载徐敬亚的《崛起》诗群而陷入“现代派风波”的旋涡。在此背景下,编辑部策划出一期国庆35周年特大号,配合形势,亦证明自己。为此,编辑部为我开了长长的约稿名单:荒煤、冯牧、洁泯、唐达成、阎纲、顾骥等评论家,王蒙、李国文、刘心武、梁晓声等作家。这些都是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,能见到他们吗?他们会应约写稿吗?我心中无底,甚感惶恐。可我的担心与疑虑,皆因见到唐达成而烟消云散——他不仅一口应承写稿,而且当他得知我与约稿的大多数评论家、作家并不熟悉后,帮我一一进行了电话联系,为我顺利完成约稿任务帮了大忙。我不敢妄言通过这次短暂的接触了解了唐达成,但他的诚挚、热情、友善,他的乐于助人及宽厚如兄长般的风范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之后不久,唐达成担任了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职务,担子重了,地位变了,工作自然更加繁忙,但诚挚友善平等待人一点也没变,不论在何种场合见面,总是主动打招呼,询问刊物的情况,问候女友安好。有几次唐达成来兰州,我退避三

热情,闪烁着艺术创作的行内人的真知灼见,焕发着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华章短制一脉相承的瑰玮俊采。

当然还有在当时的《文艺报》上大量出现的文艺论争文章。在那个历史时段里越来越“左”的文艺路线、文艺思潮的制约和策动下,有一些文艺批判运动留下了不少观点错误、内容失实、影响负面的文章,现在它们只有作为历史资料留存以供史家研究,引出经验教训的价值了。但是,也还有不少文艺论争事件和文章,现在看来,还是葆有某些学术价值的。记得我当年很喜欢看这类文章,觉得这是别林斯基所说的“运动着的美学”最生动的体现。这类文章中,围绕着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的有:关于杜鹏程的《在和平的日子里》的论争,关于高缨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的论争,关于刘澍德《归家》的论争,关

从读者到作者

□曾镇南

初中的文学知识,激发起我最初始的文艺理论兴趣的讲述生动的蒙师。

毕竟是50多年前的阅读记忆了,我实在不敢仅凭依稀的印象,就来追述那些曾点燃过我文学的智光,训练过我形象的思维、丰富了我美的感觉的文学论评的篇目和评论家的名字了。于是我借来这几年的《文艺报》订本,在这些满脸烟土色的旧刊中,寻觅起那些像有点陌生的老熟人模样的旧文。披览之余,我不禁感叹,青少年时期就读过的文章,其入心之深、植情之厚,是自己也始料未及的。有的文章当年就曾非常佩服地细读过,现在重翻,还是觉其堂阔大、涵纳厚博、藻思雄丽,一望宛然,不同凡响。如在《文艺报》连载多期的茅盾的《夜读偶记—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》(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),张光年的《“共工

不死”及其他》《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》等。有更多的评论,或曾在发表时读过,后来又在各种研究专集、资料汇编一类书中又遇到,或当时只是泛览一下,甚至只看了标题却没有读过,这次重逢,也觉得特别亲切,仍有翻看的兴味。例如李希凡、冯牧、黄秋耘(昭彦)、细言(王西彦)、侯金镜、魏金枝、冯健男、欧阳文彬、阎纲、刘金等评论家的小说评论,安旗、闻山(沈季平)的诗歌评论,川岛的散文评论,戴不凡的戏剧评论等,都有不少发表时于读者有益,现在及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者也不会轻忽的佳作。

最让我觉得兴趣盎然的是在“新的花朵”、“新收获”、“文艺笔谈”等栏目中出现的一些文艺短评和短论。比如,我记得是在《文艺报》的一篇评论中看到对赵树理的《套不住的手》的点评,才去翻《人民文学》找出小说来读的,但记不得是谁写的了。这篇千字短评现在重读,仍令我击节赞叹,确是一字不可移易的短评美文。类似的文章还有曹湜点评发表在《红旗》杂志上的“杨朔的短篇小说《雪浪花》”,冰心点评杨朔的散文《海市》、管桦的诗情小说《葛梅》,叶圣陶点评杨苏的小说《没有织完的筒裙》,周立波点评萧育轩的小说《迎冰曲》。这些精辟、优美的短评,充满了老作家的勤勉同行、奖掖新人的

于赵树理《锻炼锻炼》的论争;另外,还有主要在别的报刊上展开而《文艺报》对“讨论综述”做了转载或报道的,如关于《青春之歌》、《金沙洲》(于逢著)、《创业史》中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艺术形象的评价的论争,都是大体正常而有益的,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,体现了文艺界贯彻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方针的努力。

也有文艺论争,是围绕更深奥的文艺理论问题和美学问题进行的。那些长篇大论我记得也似懂非懂地浏览过一些。这次重翻旧刊,我看到揭载在《文艺报》上的有这么一段论文:王子野批评姚文元《照相馆里出美学》《论生活中的美和丑》两文中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美学倾向的商榷文章;王子野批评周谷城、周谷城反批评王子野;朱光潜批评周谷城,周谷城也反批评朱光潜;两造都是万字长文,都认为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;绝不能苟同循非,一定要争个水落石出,一来一往,攻防互换,这对台戏唱得煞是好看。有趣的是,受批评的周谷城反批评起来,措辞似乎更加严厉,火气很大,《文艺报》似乎也照发不误。这种艰深且难论不已的文章,有心人如果深入读进去,所得一定不会比静读美学教科书少吧,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,这世界毕竟是有是非的。

团结湖

黄古题



汪曾祺先生为中国作协主办、文艺报社承办的“喜迎50天首都文学界诗文会”而作,成为汪曾祺先生绝笔之作。

我与文艺报

庆祝《文艺报》创刊65周年

我与冯牧的交往,由少而多而繁,由浅而深